

# 鲁迅的生平和斗争 与其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请勿发表)

李 何 林

# 鲁迅的生平和斗争

## 与其杂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同志们：我是一个正在改造的老年知识分子，几年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业务上再学习，都进展得很慢。过去虽然学过一些鲁迅的著作，也搞过这一方面的教学，但是对于鲁迅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甚至有些错误的了解。由于前些时候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几位同志搞过几个月的《鲁迅杂文选》的注释工作，大家叫我来谈一谈鲁迅的杂文；因为我也正在学习，我就来谈一谈吧；谈出来更可以和同志们商量。

首先我想谈一谈“我对如何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三种困难的一些想法”；其次，我想通过介绍鲁迅的生平和斗争来看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就是按照他所生活的几个时期，来看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他是怎样由进化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进到辩证唯物论和共产主义者。最后再谈一谈他的杂文的艺术性。

### 一、我对如何解决学习鲁迅杂文的 三种困难的一些想法。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评叫《发

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号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并且要选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毛主席过去多次教导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杂文，有时甚至举出具体的杂文篇名，指示学习的要点。主席对于鲁迅的著作很早就是很熟悉的，对于鲁迅的评价是非常全面的，深刻的，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完全超过了五十年来任何人对于鲁迅的评价，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的评价和教导来学习鲁迅。

半年来的报刊上，有不少介绍和论述鲁迅杂文的文章，说“鲁迅的杂文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或者说“从鲁迅的杂文中学习阶级斗争的经验”，号召学习鲁迅的杂文，但也有很多同志反映鲁迅杂文难懂。今年的《红旗》杂志三期发表的一篇《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说难懂的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对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不熟悉。第二，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曲折，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第三，最重要的，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文章的内容和论点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但这不正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的吗？怎样解决这三种困难呢？谈一点我的想法：

对于第一种困难，“文章的历史背景”，要用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政策和策略等等的教导来解决，比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新民主主义论》等。因为鲁迅杂文写作的时间是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六，正是“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主席的四卷对这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的政治社会背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全面的论述和深刻的教导，只有遵循主席的这些论述和教导，才能正确理解鲁迅杂文产生的历史背景。至于鲁迅杂文中“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一部分要靠注释来解决，一部分要用学习一些中国现代史来帮助；主席曾多次地教导我们要学习点历史，中国史和世界史。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记录，鲁迅的杂文就是反映阶级斗争、参加阶级斗争，而且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对于第二种困难，就是表现形式隐晦曲折、难懂的问题，注释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主要的还是要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注意鲁迅自己对于他的杂文的说明和解释，有些写在每本杂文集的序言、前记、题记或后记中，有时写在书信中，有时在其他杂文中。此外，也还要有一些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了解。但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不要有畏难情绪。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参考《鲁迅杂文选》的注释，（这些注释也不一定都正确和准确）用心地读下去，对于每一篇杂文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它的主题思想，会大致掌握，不会毫无所得的。何况鲁迅杂文并不都是隐晦曲折，只是“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曲折”，也有很多明白晓畅的。例如，去年冬天《人民日报社》印的一本供内部学习用的《鲁迅杂文书信选》所选的三十六篇杂文中，也只是极少数几篇的有些地方比较隐晦曲折，如《“醉眼”中的朦胧》、《“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关于中国的二三件事》、《半夏小集》这几篇，其他各篇，则参考注释，基本上可以看懂。将来随着我们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生活和斗争的实

践经验的丰富，会逐渐加深理解，懂得更多。

鲁迅在给人信里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现在的“世事”基本上依然是鲁迅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继续，我们如果经常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注意“世事”，则鲁迅时代所斗争的阶级敌人的本质和敌人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在现在的斗争中找到敌人的某些相似之处，帮助我们理解鲁迅的杂文，同时，鲁迅杂文所总结的阶级斗争经验对于我们参加现在的阶级斗争就很有用处了。和鲁迅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固然对于阅读鲁迅杂文有某些方便条件，但也要看他的思想生活情况如何。二三十年代不是有很多歪曲诬蔑鲁迅的吗？解放后也还有不少。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相信会从鲁迅杂文中学到一些宝贵的东西。

对于第三种困难：“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内容和论点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我想上面第一二种困难如能基本上解决，这个困难就也可以解决大部分了，内容和论点也基本上可以掌握。不过如能学习一下二三十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社会政治的历史，将会更好一些。

## 二、从鲁迅的生平和斗争 看他的杂文的思想性

### (一)、一八八一——一八九八，在绍兴，少年时期（十八岁前）。

鲁迅，姓周，初名樟寿，字豫才，后又名树人。鲁迅是

他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他母亲姓鲁）。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家有四五十亩水田，是小康人家。祖父周介孚是清朝的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鲁迅十三岁时他因事下狱。父亲周伯宜是一个读书人，在鲁迅十六岁时因病去世。母亲鲁瑞，出生于农村，以自修得到看书的学力。

鲁迅从六七岁起在私塾读书，除读一般规定的古书外，还看了不少“野史”、“笔记”和“小说”，对于民间文艺如民间故事、传说和绘画，他也很爱好。故乡绍兴府的古代先贤的反抗精神和他们的著作，引起他的尊敬和注意。受过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儒家礼教和不满黑暗政治的思想影响。

当他祖父被捕入狱后，他和母亲等到农村外婆家去避难，以后又去过几次农村，因而接近了农民和农民的孩子，了解了农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给他以后描写农民，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而战斗终生打下了基础。父亲死后，他的家“从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顿”，甚至连极少的学费也弄不到，于是不得不另谋出路。到十八岁时，母亲为他筹了八元路费，去南京入了不要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

## （二）、一八九八——一九〇八在南京和日本，

### 青年时期（十八——二十八岁）

鲁迅十八岁到了南京，正是戊戌（一八九八）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君主立宪）所谓“维新运动”的时候。他入学不久，就感到不满，到第二年就改入

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读到一九〇一年底。

在南京三四年，他接触到当时所谓“新学”，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影响他最大的是英国进化论者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严复译），他从此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成为他前期（一九〇七——一九二七）战斗的思想武器，用它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到他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了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止。

一九〇一年底他在路矿学堂毕业，一九〇二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了两年日文，同时广泛地阅读了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研究“国民性”问题，也就是研究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状况，希望从这里找到救国的办法。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都表现了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使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中华民族日趋危亡。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自题小像》一诗，表现了他终生为祖国献身的思想，就是一九〇二年到日本后作的。

一九〇四年的秋天，鲁迅离开东京，到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他打算从医学入手，使中国进步、强盛。后又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不能救国；救国的要着，首先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即改造人们的思想。而改变国民精神的最有力的工具，他当时以为就是文艺。于是便决心提倡文艺运动，从事文学工作，一九〇六年七月中止学医。

一九〇七年鲁迅在东京和几个朋友计划办一种名叫《新生》的文艺杂志，但由于人力和物力的缺乏，没有实现。但就在这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重要论文，介绍了当时世界上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进步的组成部分，约略介绍于下：

《人之历史》：通过介绍十九世纪德国进化论者黑格尔（一八三四——一九一九）的“种族发生学”（即人种发展史），介绍了进化论的各种著名学说。从这篇论文看，鲁迅当时对进化论的各种学说已有较深广地研究和学习，受它的影响很深，是他今后二十年（一九〇七——一九二七）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科学史教篇》：全文简要地介绍了欧洲自然科学从希腊罗马到十九世纪初的发展概况。认为科学之所以发展，是由于人们“勤劬艰苦”劳动的结果，故“谓之教训”。指出科学与实业“相互为援，于以两进”；科学是应实业的需要而发达的，它离不开现实的需要；实业也因科学的发达而发达。这就说明了科学的各种发明并不是由于科学家的天才创造。他还主张要历史主义地对待文化遗产，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要“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也不能说“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狂妄自大，顽固保守，好象阿Q自夸他先前怎样阔一样；到一九一八年他又在《随感录三十八》里批判了“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种骄傲自满的思想。

《文化偏至论》：本文批判了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化思潮偏到一方面去了，就是重物质，崇众数；它提出要重精神，重个人。他反对走“重物质”的道路来救中国，即反对单搞武力、兵事救国和工商业救国；反对走“崇众数”的道路



来救中国，即反对用资产阶级的“立宪国会”所谓“国民代表”的众数来救中国。他认为兵事和工商业固然不能救中国，“立宪国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不过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在十月革命前十年，五四运动前十二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处在辛亥革命前四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鲁迅，竟能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假民主的议会政治批判的如此深刻，不能不说是当时很突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之所以重精神、重个人，也是要使人们的精神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摩罗诗力说》：摩罗，通作魔罗，梵语，即恶魔，魔鬼；基督教称为撒但。传说摩罗和神（或上帝）为敌，有叛逆反抗精神；鲁迅在此借用，对有反抗战斗精神的诗人的诗，说它具有摩罗的诗力。

全文约二万四千字，是当时罕见的长篇文学论文，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八个具有反抗战斗精神和爱国思想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孟托夫，波兰的密克微支、斯洛伐支奇，克拉甸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说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他们“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

“拜伦、雪莱，虽蒙摩罗之谥，亦第人焉而已。”“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鲁迅极希望中国当时能有这样的精神界战士反抗战斗。他并用此标准，评价了屈原：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这就和几十年后有些人心目中的屈原有所不同。

鲁迅说拜伦对待受压迫而不能反抗的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这也是鲁迅在十多年后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对待他写的被压迫人物的主要思想，尤其对阿Q。

这一篇还表现了鲁迅已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认为自然界和人间自古以来充满着矛盾斗争，平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反对为着平和而不敢面对现实斗争，逃避于理想之城，或唐虞古初；反对老子的“无为”思想。又说自然界和社会都是进化的。

除一九〇七年写的这四篇重要论文外，在一九〇三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已有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一九〇八年又写了《破恶声论》（未完稿），要破三种“恶声”（坏声音、罪恶的声音）：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破尽义务这一部分未完成。1、破“破迷信”的恶声：他认为农民劳苦一年，在冬闲时“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稍息心体，备更服劳”，不能算迷信，当作迷信来破，是不对的。也不能把神话当作迷信来破。2、破“崇侵略”的恶声：崇侵略，即崇尚帝国主义侵略，鲁迅要破这种恶声，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反对任何大国侵略弱小国家；反对侵略别人，也反对托尔斯太的勿抵抗主义。主张中国应该“扶掖”“危邦”，帮助被压迫小国，使帝国主义“失其臣奴”即失掉它的压迫剥削的对象。鲁迅一九〇八年的这种思想，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才实现了。

此外，还译了一些北欧小说，后来收在《域外小说集》

中。

一九〇八年，鲁迅在日本认识了当时的革命家章太炎，并且加入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光复会”为会员，参加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 （三）、一九〇九——一九一七，从辛亥革命前后 到十月革命（二十九——三十七岁）。

一九〇九年夏，辛亥革命（一九一一）的前夜，鲁迅从日本回国。担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和生理学教员。一九一〇年暑假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中学堂的博物学和生理学教员兼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鲁迅热烈欢迎这个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的革命。绍兴光复后，鲁迅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也在这一年他写了文言小说《怀旧》，描写一位私塾教师愚昧可笑，显示了反封建的讽刺才能。

一九一三年写《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他认为美术是经过艺术家的思想（思理）改造了和美化了的客观世界的自然之物（天物），“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这是朴素的唯物论的美学理论，虽然还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工作（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升佥事）。不久，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之北上。

辛亥革命失败了，除了革掉一个皇帝的招牌，统治的仍然是封建势力。满怀希望的鲁迅，很快就感到失望。从一九

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这段时期，鲁迅在思想上陷在苦恼之中；但他并没有消沉，却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他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

在这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七），鲁迅一面在教育部办公，一面努力于中国古籍的考证、纂辑和校订等的整理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在学术上有很大的价值。

#### （四）、一九一八——一九二三，五四时期（三八——四十三岁）。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了，而且成功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布。马克思主义一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变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彻底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一九一九年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一九二一年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不久也就产生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鲁迅成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一九一八年四月鲁迅写了小说《狂人日记》，这篇被看作是“反封建的第一篇宣言书”的作品，它揭露和批判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号召要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救救孩子”。

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发表的杂文《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里，他歌颂“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并号召人们要向那曙光抬起头来，迎着那曙光走去。“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革命后刚刚五六个月，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就能有如此深刻正确的认识，除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从一九一八年发表《狂人日记》开始到一九二三年，这整个“五四时期”的五六年期间，鲁迅共写了杂文集《热风》和《坟》的一部分，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六首白话诗；还翻译了短篇小说和童话共三十多篇，长篇小说和童话剧共三篇，文艺论文两本和其他。鲁迅就用这些杂文、小说和译文参加了五四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他以后自称他这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他从事写作的目的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只是五四时期的革命文学，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他的后期杂文并且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他一生遵奉的也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他本人也始终是一个革命前驱者。

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期间，鲁迅的几十篇小说和杂文中，《阿Q正传》已经译为几十种文字，是世界闻名的作品。它不但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不少人具有的“精神胜利法”，而且提出了农民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它具体描写了象阿Q式的贫雇农，是有革命的愿望和参加革命的可能性的，但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假洋鬼子”们不准阿Q革命，没有动员

广大农民参加革命，革命遂失败了。鲁迅在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二初通过小说形式提出来的这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并没有被以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接受，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象“假洋鬼子”似地不准农民革命，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遭受到重大损失，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他们进行斗争，并指引着革命前进，中国的革命会又一次象辛亥革命那样失败了。鲁迅总结的这个经验是很宝贵的。

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写的《我的节烈观》里，对残酷迫害妇女的所谓“节烈”思想，给以猛烈的攻击。并号召“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指出“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不允许残害妇女的野蛮道德存在。

一九二〇年起鲁迅在北京大学等校教书，编著了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

### **（五）、一九二四——一九二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十四——四十七岁）。**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一九二四年初，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旧三民主义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的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其在

的走狗封建势力及其代表，还得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业已形成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是五四运动中的右翼）；鲁迅对这些代表人物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进行了面对面地坚决地斗争。

鲁迅在一封信里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但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则反谓我‘太凶’。”鲁迅在这四年中的主要著作是杂文集《华盖集》（一九二五）、《华盖集续编》（一九二六）、《而已集》（一九二七）和《坟》（一九二四——二六）的大部分，还有小说集《彷徨》（一九二四——二五），散文诗集《野草》（一九二四——二六），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一九二六）和《故事新编》（一九二二——一九三五）（新历史小说）中的《补天》、《奔月》、《铸剑》三篇。（译文在外）

鲁迅运用杂文、小说、散文诗、回忆散文和新历史小说等等文学形式，进行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斗争，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和反它们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斗争。这里只能选几篇杂文为例：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五卅”运动前夕，鲁迅发表了《灯下漫笔》这篇杂文，揭露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广大人民作奴隶的历史。广大人民受压迫受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给少数压迫剥削者安排着“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

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和一般地主资产阶级学者美化中国历史不同（他们分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鲁迅直接了当地划为两个时代：“一、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作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农民曾举行过数十百次的起义，因限于进化论世界观，他还认识不到。）他号召青年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灯下漫笔》较之七年前写的小说《狂人日记》“吃人”的主题，有更明确的朴素的阶级观点，更鲜明地号召推翻吃人的社会，不止于“救救孩子”。以这种思想为基础，自然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使他在后期成为阶级论者。

对中国社会的改革问题，是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还是彻底的“革命”，这是买办资产阶级胡适派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派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鲁迅是当时革命派的光辉代表之一。

在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前后都有一些顽固守旧的官绅和知识分子，盲目称赞中国的所谓“精神文明”，反对新思想新文化。到一九二五年前后有所谓“东西文化”之争，梁漱溟写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称赞中国和印度的封建文化是“精神文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科学和民主是物质文明，说精神文明比物质文明好。鲁迅则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针锋



相对地戳穿了他们的“精神文明”的实质。鲁迅还对他们的尊孔读经，维护文言、反对白话进行了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鲁迅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著名的杂文。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就是对待敌人要宽大，尤其是对待已经塌台的人物，不要再穷追猛打，象对死老虎、落水狗一样，不要再打它了。这是汉奸文人周作人和买办文人林语堂（他们当时的反动面目还没完全暴露）先后提倡的对革命极其有害的反动“精神”。鲁迅认为落水狗和死老虎不同；老虎死了，不再能吃人，狗虽然落水，爬上来却仍然会咬人。暂时下台的军阀官仔段祺瑞、章士钊之流，又和落水狗不同，他们广有金资和党羽，并没有真正落水或塌台，一旦上台，还是要害人的。鲁迅总结了血的历史教训，结论是：“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对貌似不偏不倚、实际是为主子效劳的叭儿狗（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学者）“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不打落水狗是害人的。鲁迅说“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鲁迅一生的对敌斗争，是实践了“打落水狗”精神的；“打落水狗”已经成为任何革命者战斗的格言。段祺瑞、章士钊暂时下野了，林语堂就反对“再攻击”他们；但在鲁迅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两个月，他们又一手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死伤青年数十人，又来了一次不打落水狗的血的教训。对待敌人是姑息养奸，还是彻底打倒？这是两条路线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经过五四时期几年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战胜了封建思想和胡适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白话